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 陈辽 文学评论选



ZHONGGUODANGDAIWENXUEPINGLUNCONGSHU

# 陈辽文学评论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 陈辽文学评论选

责任编辑：谢明德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4,000 印张：9.375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10109·1916 定价：(平装)1.45元 (简易精装)1.65元



作者近影

#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建国以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

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牧 阎纲 刘锡诚

1982年10月13日

## 目 次

### 也算序文

——读《陈辽文学评论选》…………沈敏特( 1 )

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 9 )
填“空”，去“昧”，戒“骄”	( 16 )
铁划银钩出“金环”	( 23 )
对话马烽近作的技巧	( 29 )
评鲍明路同志的诗作	( 38 )
看了陆文夫同志的近作所想到的	( 48 )
《善卷游》和《秋夜》	( 58 )
两代人创业的启示	
——读《创业史》(第一部)有感	( 61 )
一个新人的“出山”	( 67 )
关于《出山》和对王如海的思想道德评价	
——与赵天同志商榷	( 71 )
构思·形象	
——议论一下凤章同志的创作	( 85 )

“傲”的英雄性格	
——喜读《傲霜篇》	(94)
报告文学中的时代风貌	(99)
艺海浮沉话《柳堡》	
——记《柳堡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李进	
一夕谈	(111)
鲜花和匕首	
——读小说《内奸》	(127)
环境——人物	
——读刘富道短篇小说《眼镜》	(130)
心理描写在《献身》中的巧手妙用	(133)
这里有他自己的东西	
——评高晓声的四篇近作	(136)
对三十年军事文学的回顾和思索	(153)
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争议中的	
几个问题	(174)
长篇军事文学的新突破	
——评《冀鲁春秋》	(189)
他也在寻找	
——读董会平的四篇小说	(204)
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215)
铁马金戈秦王曲	
——评新编历史剧《秦王李世民》	(234)
发现·表现·显现	
——读《胡“司令”赴宴》	(243)

新的中国的脊梁	
——兼谈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246)
论当代文艺思潮的特殊性	……………(254)
论当代文学学的建立和发展	……………(267)
不必要的忧虑	……………(285)
后记	……………(290)

# 也算序文

——读《陈辽文学评论选》

历史的前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们应当力争，使这个代价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认为可以无须付出代价，是幻想家的盲目乐观；认为可以不计代价，却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的蛮干思想。须知，正是我们有着最大的可能来担负这样一项历史重任：争取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获得尽可能大的历史前进的成果。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包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文艺事业）与过去一切的人类活动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的事业是以彻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

建国以来，我们在各个领域（文艺也是一个突出的领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分来说，是必须的。因为，认识一个事物必然有一个曲折的过程。部分来说，又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我们中间有一部分这样的同志，对于事业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密切注视我们事业的发展变化。他们比较早地发现了还属萌芽状态的矛盾，发现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危机。于是，他们发出了热诚而又急切的呼唤。如果我们有健全的民主生活，而民主权利又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加以保证，那么即使这些呼唤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却仍然有可能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研究；这些同志的可贵的认

识可能及时转化为多数人共同的思想财富；我们必须经历曲折，却可能绕过很多险滩；必须付出代价，却可能大大地把它缩小。可惜，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常常不如人愿，这些同志的可贵的认识甚至被当作“异端”加以排斥和抨击。今天，当沉重的代价已经付出，我们才懂得，认识有先有后，重视少数人的新见解并给予切实的保护，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翻读陈辽这本文学评论集时所发生的第一联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深沉的感慨。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夕，陈辽连续写了《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填“空”，去“昧”，戒“骄”》两篇评论，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这两篇评论的价值在于围绕着“双百”方针问题分析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露头的“左”倾思想，对于文艺领域“左”倾思想的特点、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陈辽认为，对“双百”方针贯彻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作出“悲观怀疑”的估计，是文艺领域“左”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针锋相对地热情赞颂“双百”方针带来的新的思想面貌，旗帜鲜明地大胆肯定《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重放的鲜花”的作品是“双百”方针有所贯彻而开放出来的可喜的鲜花。事实证明，五七年反右的扩大化以及嗣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十年浩劫中敌我的完全颠倒，其指导思想与这个“悲观怀疑”的估计是一脉相承的。而翦灭四凶之后，针对思想解放运动发生的种种的“左”倾言论又有哪一个不是从这种错误的“悲观怀疑”的估计出发的呢！是的，夸大敌情，无限上纲，混砍乱伐，掐死鲜花等等，都由此而来。值得重视的是，陈辽在当时就分析了“左”倾思想的产生原因，尽管今天看来那时的分析有待于深化，然而他的一些见解可以说至今仍然新鲜。他把

这种原因概括为三个字：“空”、“昧”与“骄”。所谓“空”是指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美学理论）的无知，“昧”是指对发展变化着的新情况的无知，而“骄”则是一种把“成绩是基本的”加以绝对化的盲目的自大。我常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如果单是骄横而并非无知，或单是无知而并不骄横，我们的事业可能会进展顺利一些。可惜，二十多年来事实恰如陈辽当时所概括的那样，“左”倾思想常是无知与骄横水乳交融凝结一气的结果。特别应当指出，陈辽当年把无知视为“左”倾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革命导师曾经指出：“不学无术是一种恶魔的力量，我们担心它会成为许多悲剧的原因。”<sup>①</sup>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文化水准较低的国家里更须谨防“恶魔”。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无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捍卫者恰恰对自己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相当无知，再加上以权力为后盾的骄横，形成为一种使“左”倾思潮愈演愈烈的“恶魔的力量”，演出了给我们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悲剧。

是的，五十年代陈辽这样一些同志先行获得的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转化为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思想财富，是一个我们今天仍应重视的深刻的教训。但是，二十多年来，陈辽个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起点上，一步一个脚印，随着我们事业的向前发展，实践着自己已经获得的正确思想。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获得了比较充足的客观条件，陈辽当年的正确见解有了较快的进展，变得更加系统和深刻。

他以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探求着文艺事业如何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1卷第97页。

免代价过重而发展较为顺畅的途径，密切注视着可能阻碍文艺发展的种种思想障碍，特别是“左”倾思潮的各种表现。无论是一九七七年关于要不要批评《纪要》的争论，一九七八年关于是否存在“黑线”的争论，还是一九七九年所谓“歌德与缺德”之争，一九八〇年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争论，直至不久之前对于所谓“十六年”荒谬提法的批评，我们都看到了陈辽的及时的反应。他的反应却又不是枝枝节节，就事论事的，而总是建立在比较系统、比较深刻的基础上。他的《对三十年军事文学的回顾和思索》、《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论当代文艺思潮的特殊性》，集中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带有一定的总结性质。就是那些对于个别作品的评论，如《艺海浮沉话〈柳堡〉》、《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争议中的几个问题》等，也常从个别到一般，包含着对于“左”倾思潮发展的历史回顾，和对于“左”倾思潮的根源的更深入的探索。较之“空”、“昧”与“骄”更深广了，他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研究了相关的文艺理论本身的失误等等；尤其是封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思想的强大存在，更引起了他的重视。譬如当有人指责《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时，他细致地分析了这个作品之后指出，建国以来曾多次批判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潮（如对《我们夫妇之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判），却恰恰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间当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文艺作品中货真价实地反映出来的时候，却“谁也没有批评过”。这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的十分矛盾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强大存在。在《论当代文学学的建立和发展》中，陈辽对当代文学评论、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一般说来，当代

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某一具体作家、某一流派作家的创作和某种文学现象，带有第一线的性质，要求迅速、及时、正确；而当代文学学则以当代文学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它充分吸收和利用当代文学评论和批评的成果，而又把它们概括、集中，加以系统化，带有第二线的性质，要求有更高的科学性，更大的指导性。”这里透露了一个消息：陈辽力图站在当代文学学的高度去进行文学评论和批评。为什么他的文学评论常常把历史的连续性及历史过程的众多侧面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深刻的评论特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于对“左”倾思潮的不断深入的剖析，陈辽对“左”倾思潮的弊害是十分了解的。他不是简单地把这种了解转化为感情上的鄙夷，而是身体力行，追求文学评论的科学性，抵制“左”倾思潮对文学评论的侵袭。

譬如，绝对化是“左”倾思潮的一大弊端。陈辽则力求辩证的分析。五十年代，他批评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就没有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对于陈其通等“意见”中的合理部分给予了必要的肯定，并以充分说理的方式剖析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当时他深深懂得，贯彻“双百”方针，使文学评论工作者“面临到一个新的考验：即能不能采用说理的方法，解释我们认为正确的東西，反驳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東西。然而说理是需要真才实学的”。<sup>①</sup>二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陈辽文学评论涉及问题之广，古今中外、各种体裁的作品以及繁多的理论问题，我们看到了他孜孜不倦的科学精神。在好几次通信中，他强调要在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安排“读书为主”的阶段。好学奠定了

---

① 陈辽：《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一个牢实的基础，使他的文学评论有可能正确处理战斗性和说理性的关系。就象陈辽本人憨厚、沉静的形象一样，他的评论绝无盛气凌人、以势取胜的痕迹；娓娓而谈，静静地分析，一层又一层，在充分说理的过程中完成理论上的进攻任务。——是的，在理论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气势上），他是进攻型的。

又譬如，忽视文艺的特征是“左”倾思潮的又一个弊端。而陈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注意研究作家的艺术构思过程。《铁划银钩出“金环”》真切细致地解析了作家在塑造人物中的苦心孤诣，使《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为之叹服，称该文“深得我心”。在对当时还很年青的陆文夫、凤章等人创作的评论中，他进一步考察了创作中各个因素的联结，正确阐述了“艺术构思本身是一个整体”的思想。由于当时文学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影响着创作，“思想在先，形象落后”的脱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陈辽敏锐地察觉了。一九八一年，在一篇关于石言的《胡“司令”赴宴》的评论中，陈辽又从另一个角度把艺术构思整体中的重要环节概括为“发现”、“表现”与“显现”三个方面，揭示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无论是从横的方面揭示艺术构思整体中各个因素的联结，还是从纵的方面揭示艺术构思整体中各个环节的统一，陈辽都强调这种联结和统一的基点是作家必须坚持从生活出发。正是重视从生活出发的创作基点，引出了陈辽比较强调的两个艺术见解。一、生活是多样的，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法也必须是多样的。五十年代他分析马烽的技巧，指出作家善于在重要时刻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阐述了这种技巧的长处。但同时指出，不能要求任何作家，也不能要求马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使用这种技巧。“从生活到艺术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的”（《看了陆文夫同

志的近作所想到的)。我们知道，批评标准的偏狭，力图把无限多样的艺术创作拘囿在几条凝固不变的戒律中，正是“左”倾文艺思潮的顽症。二、生活是复杂的，人物性格无论所谓正面或反面都不能简单化。从五十年代开始，文学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尤其表现在关于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的讨论中。陈辽当时就提出了质疑：“把提倡写正面英雄人物，片面地理解为只能写英雄的优点，不能写英雄的缺点，又是否恰当！”(《填‘空’，去‘昧’，戒‘骄’》)他看到这种理论对近年的创作仍有影响，从而指出即使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长篇小说《冀鲁春秋》，其中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也有从路线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因而简单化了的瑕疵。对于高晓声笔下那些既不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脊梁骨”，又反映了历史暗影的人物性格，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三国演义》中的军事天才诸葛亮、曹操，作家也不讳避他们的失误，其结果真实可信，无损于形象的艺术价值。

二十多年来，陈辽的文艺评论活动当然是一个发展过程。既然是一个发展过程就必须伴随着不平衡的现象。早期的评论不乏真知灼见，毕竟不如近期评论那样系统和深刻；六十年代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他的评论不无拘谨之处；近期评论在迅速发展中，个别提法也难免欠周详的地方。譬如他认为，长期多次反右，使“人们对右的东西的觉察、辨别能力一般说是不低的”<sup>①</sup>。我的想法略有不同。二十多年来，反右经常是从“左”的角度出发的，所谓对右的“觉察”常有过敏的弊病，因而所谓对右的“辨别”也常有是非颠倒的误差；长期多次反右并没有使人们获得科学分析的本领，造成的却是“左”倾思潮愈演愈烈的结果。

---

① 陈辽：《论当代文艺思潮的特殊性》。